

一波三折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

“大内档案”是指清政府于康熙九年(1670年)起开始存放于紫禁城里内閣大库内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皇帝诏令、臣僚进呈并经皇帝批阅过的奏章、朱谕;皇帝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会典、历科殿试的卷子等。围绕这批重要档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演绎了一波三折的“伤心剧”……

“大内档案”险遭焚烧

溥仪年幼登基,由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下令内閣大臣去查看清朝立国之初摄政典礼的旧档,以便给自己的位置找到历史依据。大臣在内閣大库寻找之后,发现里面十分混乱,向载沣报告说里面的无用旧档太多,应当焚毁一部分来减少库存。载沣同意了,于是从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初一开始,派一些人每天从大库中挑选无用旧档,用时一个月挑出了一万六千余捆,堆在院落中等待焚烧。

对于堆在院中准备焚毁的那些史料,学部参事官罗振玉认为十分有价值,当内务府大臣宝熙等人要执行命令焚毁这些史料时,罗振玉到处呼吁,最终说服张之洞奏报朝廷,将这批档案保护了下来。

张之洞也很明了这批史料的价值,他设法保护下来后,嘱咐参与人不要将此事泄露出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宣统三年(1911年),皇帝宣布退位,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国子监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原藏在学部的这批档案装成8000麻袋堆在了筹备处的敬一亭内。在此期间,已经有

些工作人员从麻袋中将档案偷出,带到外面去卖钱,此事被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胡玉缙看到了,他担心偷盗太多之后,最终那些人为了销赃灭迹会放火烧掉这些史料,于是将此事报告给了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

胡玉缙希望教育部能迁移这些史料,或者销毁无用之废纸。但夏曾佑不赞同胡的建议。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佾事,对此写了篇《谈所谓“大内档案”》,他在此文中认为夏曾佑:“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些档案在敬一亭放了几年后,教育部派鲁迅等人前去查看,此事仍无处理意见。直至1921年博物馆筹备处的某人将这8000麻袋的史料,以处理废纸的名义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

转年2月,罗振玉在市场上发现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明代档案,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内閣大库之物,之后想办法找到了同懋增纸店,与之商议将这批史料买回。纸店老板原本是以4000元买下这批史料,见到罗振玉很重视,便坐地起价,以13000元转售给罗。罗立即返回天津,通过筹款将这批档案买了下来。

不幸之中的万幸

因为罗振玉是借钱买下的这批史料,又要租赁存储之地,导致他无力长

期保存,日本人听闻此事后准备将其买下。消息传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教授马衡等人提出强烈批评,坚决阻止这批史料运出京津。国民政府闻讯后,立即派农矿部参事李宗侗等人前去了解细节,罗振玉无奈,只好将这批史料卖给了藏书家李盛铎。

然而因为社会动荡,李盛铎也无力保存,想要将其出让。马衡得知后,写信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请其想办法买下,但因款项太大,傅斯年认为很难将其拿下。此后又传出燕京大学准备买下这批档案的消息,史语所史学组主任陈寅恪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傅斯年:“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陈寅恪努力说服各个学术机构,希望能买下这批无价之宝,后来傅斯年来北京办事,陈寅恪见到他时,力主由傅出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傅斯年也觉得如果史语所能够买下这批史料,就具有了极大的资源,于是他在1928年9月11日给蔡元培写了封信,请蔡元培想办法将其买下,后中研院责成历史语言所来整理。

蔡元培接信后,认为傅斯年所言在理,立即发电报给农矿部参事李宗侗和清华的陈寅恪,请他们立即与李盛铎商议收购事宜。此后几经磋商,最终在1929年3月,李盛铎将剩余的7000麻袋售予中研院。

在此期间,陈寅恪也费了很多心血,对此,作家岳南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称:“内閣档案的交易,是陈寅恪加盟中央研究院以来,为史语所具体承办的第一件大事和实事。从后世留存的陈傅二人通信看,自1928年至1929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商讨内閣档案的收购事宜。”

此后,这批史料运到了北京,岳南在此书中写道:“1929年8月,在陈寅恪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李盛铎转让的档案全部运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破烂不堪者约2.5万公斤——这是史

语所自成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

整理结束后所装灰土有120袋

对于这些档案,傅斯年当然也很看重,希望尽快从中找出重大发现。但是史料的发掘没有那么快,民国文林编著的《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中写道:“一次,李济(考古学家,编者注)与傅斯年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傅颇感失望。李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笑问:‘什么叫作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清没有人关的证据吗?’傅听罢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

明清史料到达史语所北海办公处后,由陈寅恪带领一些人员进行整理,岳南在《南渡北归·南渡》一书中写到陈寅恪时称:“除在清华授课,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北海静心斋带领史语所历史组李光涛等人整理内閣档案。”

经年累积,这些档案上有着厚厚的灰尘,李光涛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些灰尘擦掉,然后将拉散的文档尽量地缀合在一起。李光涛在《明清档案与清代开国史料》一文中回忆说:“我们乃是整天的8小时都在字纸堆里爬进爬出,一片片的字纸都要展开细看的。而且这些字纸都是几百年的旧物,附带的尘土又特别多,每一麻袋或席包倒在地上时,尘土便腾起多高,室内差不多犹如烟雾一般。不说别的,单说这些麻袋在我们整理结束之后,所装的灰土便有120袋,堆在午门前端门洞内,每袋灰土最少以100斤计算的话,也就共有1.2万斤之多了。”

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往四川,傅斯年十分看重史语所的档案及20余万册藏书,他将馆中所藏装了600多个大箱,指定由管理员那廉君护送。五年内,他们先后装运火车、卡车、轮船,最终将这批书完好地运到了四川李庄,抗战胜利后又安全地运到了南京。因为这段经历,傅斯年被人戏称为“搬家先生”。1947年时,档案被运至北平,1958年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据《北京青年报》韦力/文

叶圣陶为一个“到”字开研讨会

教育家叶圣陶是江苏人,平时说苏州话较多。为了语言规范化,叶圣陶在担任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期间,要求文章入选课本前,需经北京语文老师朗读,以查验语句是否通顺,音节是否优美。

一次,一位老师为叶圣陶朗读文章,读得较快。叶圣陶打断他,指着课本上的语句问:“这句话到底是读‘东西掉到井里了’,还是‘东西掉井里了’?”

这位老师搪塞道:“我想这两种读法都一样。”叶圣陶接着问:“依你看也就是‘到’字在这里是多余的?”这位老师难为情地笑了笑,借故离开了。

叶圣陶为了找到准确答案,决定召开一个主题讨论会,确定一下“到”字的应用。对于主任的决定,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为了一个字

召开一个主题讨论会有必要吗?”也有的人毫不客气地说:“这是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

见此情景,叶圣陶微笑着向大家解释:“大家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静下来想想,我们做编辑尚且拿不准的句子,怎么能印刷出来交给学生呢?这虽然只是一个字的小事情,但关乎几百万中小学生的事情,就应该作为大事来对待。”

听了叶圣陶的解释,编辑们纷纷点头称赞,他们分头寻找资料,落实“到”字的准确用法。次日,讨论会开得很成功,与会者踊跃发言,大家详细介绍了“到”字在句子中的意义,在此句子中“到”有达于某一点,即到达的意思。因此,大家一致认为“到”字在这句话中有一定含义,不可随意删去。

据《人民政协报》张雨/文